

Collected Works of
Huang Qichen III

黃啟臣文集 (三)

明清社會經濟及文化



黃啟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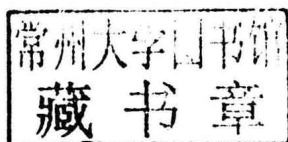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黃啟臣文集 (三)

—— 明清社會經濟及文化

黃啟臣 著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黄启臣文集（三）——明清社会经济及文化

作 者：黄启臣

责任编辑：韦 民

封面题字：周正山

封面设计：张丽娟

责任印制：涵丰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na Review Academic Publishers Limited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国卫中心16楼1602室

Rm.1602,16/F,AXA Centre,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Hong Kong

电话TEL: (852) 28816391

传真FAX: (852) 25042131

电邮E-mail: chinareview@chinareviewnews.com

网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承 印：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

版 次：2010年3月初版

书 号：ISBN 978-988-8051-26-7

定 价：人民币68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言

2003 年和 2007 年，我曾出版过《黄启臣文集》和《黄启臣文集（二）》两书。现在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又热情约我再出文集。因此，我又将已发表的部分论文选编成册，名曰《黄启臣文集（三）》付梓。

我记得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师祖、1898 年发明钋和镭元素以及后来分离镭而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1903、1911）的第一人、著名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玛丽·居里（Marie sklodowska Curie，本名 Manya sklodowska，1867 - 1934）说的一句名言：

“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中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

完全正确。人类文明和科学进步的知识宝库，都是在很小很小的事上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都是万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人集体智慧创造的结晶。在这个漫长的人类创造知识的进程中，凡是为人类知识宝库付出过劳动，不管是添砖加瓦，还是挑泥担沙，都会给人类知识宝库增加分量和增添光彩，都是有功劳和贡献的。用居里夫人的话来说，“也是伟大的”。有鉴于此，我本着向人类知识宝库“投进一粒沙子”的精神，选编第三本文集出版。

本文集再次得到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的全力支持，总编辑韦民先生又一次为文集担任责任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艰巨劳动。在此，谨向出版社及韦民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86 岁高寿的著名书法家、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正山

先生为本文集题签书名，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集的英文目录是暨南大学历史系刘正刚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翻译，谨表示衷心谢意！

本文集出版之际，适逢我读本科提前毕业留校任助教 50 周年和读研究生毕业 45 周年，藉此作为纪念。

黄启臣 谨识

2010 年 2 月 20 日

于中山大学

目 录

跟随梁方仲教授学习和研究明清社会经济	(1)
一只看不见的手	
——回忆梁方仲教授指导我阅读和重读《国富论》的体会	
.....	(17)
热情奖掖后学的金应熙教授	
——回忆金应熙教授对我的教诲、爱护和帮助	(34)
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对城市形态变迁的影响	(40)
明清时期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	(61)
清朝广东商人与华侨	(68)
广州十三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	(87)
明清以来的粤澳关系	(90)
中国人在加拿大(1788 - 2009)	(162)
客家帮商人之会馆	(242)
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	(257)
一部填补空白的开创性巨著	
——评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 - 1999)》.....	(573)
一部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著	
——评顾润清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584)
附 录:	
黄启臣自编年谱	(594)

游历美国最南端的天涯海角	(645)
一部开拓性的海外贸易史巨著	刘正刚 黄国信(649)
黄启臣近年论著目录(2004—2010)	(653)

Contents

Preface

Studying and researching socio—economic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Professor Liang Fangzhong (1)

An invisible hand—Recollect Professor Liang Fangzhong

guides me Throughs on reading “The wealth of Natons” and

again at New (17)

professor jin yingxi who always nurturing and encouraging

younger generations —Memories of teacher Jin Yingxi ’ s teaching,

and helping to me (34)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the impact of urban form

changes in Guangzhou (40)

The trade of tea between Holland and Guangzhou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61)

Guangdong businessmen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Qing Dynasty

..... (68)

The thirteen banks in Guangzhōu: Deal with business by

government, Deal with barbarian by business (8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90)

Chinese peoples in Canada, 1788 – 2009 (162)

Hakka businessman ’ sHall (242)

The Pearl River cul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257)

An initiding monumental work wtich fills in the gaps – reviewing

Huang Qing – hua “The History of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	(573)
A New book About Guangdong silk road at se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Guongdong silk Road at sea by Gu Jianqing	(584)
 Appendix :	
Huang Qichen self – compiled Chronicle	(594)
Traveled corner of the earth in the southernmost of the USA ...	(645)
A Monumental Work on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Trade	(649)
Recently publication contents of Huang Qichen (2004 – 2010)	(653)

跟随梁方仲教授学习和研究 明清社会经济

我读研究生（1961.9 - 1965.9）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明清社会经济方向），指导教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的二级教授梁方仲先生。我是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1959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是杨生民，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两届均各招一人）。当时的研究生学习不是实行学分制，除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外语课由学校统一集中上课和考试外，专业课则由指导教师全盘负责安排。一年级时，梁老师规定我每个星期五早上9时到他家里上课。开学第二个星期，我去他家里上课。他布置我读书，先读《明通鉴》，然后读《明史纪事本末》、《国榷》三部书，一年读完。要求是通读一遍，一边读，一边将书中有关明代社会经济内容的页码记录下来，方便今后研究查阅。一周读完一部分，下周来上课时，将读过内容汇报，并说明读不懂的问题，由他讲解。二年级时，梁老师要求我用二个月读完《明史·食货志》，要求同上。之后，要求我用7个月时间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要求是每周上课时将读不懂的问题向他汇报，由他讲解。他说，在读完上述书后，于三年级上学期考试，下学期提出毕业论文题目和写作提纲，四年级全年撰写毕业论文。

三年级下学期中，按规定要选定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到梁老师家里登门求教。他说，我不给你出题目，你可就明清社会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范畴选一个小题目。又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时，本来应该选做现代社会经济的某一题目的，但我

听了历史系好朋友吴晗的劝说，选了《明代田赋制度述要》为题，属分配范畴。我听了老师的教诲和启发，最后我自选《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为题报告老师。四年级上学期开学伊始，我到老师家征询他的审查意见。他同意了。不过他说，你的选题属于明代手工业生产范畴，找资料不容易。因为在明代古籍中，记载生产方面的资料不多，只有明代地方志、政书和私人笔记等史书中略有记载，但地方志等史书汗牛充栋，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花大力气才能收集比较足够的资料。但现在你选定了，努力去做就是了。

选题得到老师同意后，我先在学校图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集资料。可惜两间图书馆所藏明代地方志寥寥无几，所得资料不多。我向老师如实汇报，他也为我着急。于是梁老师于1965年8月，亲自带我到收藏明代地方志、笔记等史籍较多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和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明代藏书楼去收集资料。在北京期间，因为梁老师和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是30多年的挚友，经介绍，使我得以认识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研究宋史专家）。当吴晗问及我的论文题目时，他饶有兴趣。于是梁老师叮嘱我多向吴晗请教指导。我遵师嘱，曾多次到北长街3号的吴晗家登门求教。他不仅热情接待我，而且将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及任教时抄录积累的有关卡片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又让我使用他书房的各种明史书刊；他还细心地审阅了我的论文写作提纲并加以修改，然后又教我如何收集、考订、爬梳、整理资料，从而进行综合分析，加以理论说明，得出自己研究本课题的结论，使我受益匪浅。在吴晗和梁老师的亲切指导帮助下，经过半年的努力阅读、搜索，我基本上查阅了全国各省、县的明代地方志和一部分有关的明人笔记等史籍，抄录了与我的论文有关的资料卡片两千多张。然后回到学校，在老师悉心指导下撰写和完成毕业论文《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约6万多字，毕业了（当时国家没有设授学位制度，连毕业证书也到1983年才补发）。

遗憾的是，毕业时正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无法按所学专业从事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才重新开始。

一、研究明清时期的工农业生产

1976年10月6日，活捉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华国锋（时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先为“文化大革命”时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平反，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号召科学家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手搞科研，并承诺自己愿意为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当后勤部长，深深感动了科学家们。这意味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欣喜若狂，从木箱中翻出随我南北辗转的毕业论文再次阅读修改，并将6万多字的论文压缩成1.5万字，投向杂志发表了（《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本文研究统计，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中国生铁产量已达到4.5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接着，我根据1965年在北京等地抄录的资料撰写题为《明代铁冶业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质疑》的论文发表（《学术月刊》1980年第2期）。1984年，我又将毕业论文进行补充、修改和增订成专著，易名为《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交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得经济史学界杨生民教授等在《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发表书评的好评。与此同时，我又写了《清代城市私营手工业及其同行业组织》，《清代农户手工业生产形态》等论文发表。在对手工业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转向农业生产的研究，撰写和发表了《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时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古今农业论丛》，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农业生态系统》（《古农业生态学术论集》，百花出版社2003年）、《清代农村家族组织的生产形态》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3年第5,6期）等，论证了清代的农业生产也是发展的，其标志是当时南方水稻年亩产量达到了351—450斤左右；北方小麦、玉米年亩产量250—340斤左右，从而养活了占世界人口30%的三亿多人口（1790年的人口数）。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达到白银4000多万两。

经过上述对明清时期工农业生产的研究，并与西方国家作比较，我得出结论：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欧洲仅占23%……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1]。”

这就说明，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仍居首要地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和中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西方国家的作家报道所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的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2]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人更是赞叹不绝，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丝货”^[3]。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4〕}

确实如此，据《明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16-19 世纪初期，中国向世界出口的商品有 236 种之多，其中以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为大宗。

二、研究明清时期的商品流通

如上述，既然中国的工农业商品如此丰富和精良，而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商品必须全面转手”才能继续发展。于是我把研究工作转向流通领域，于 1984 年撰写了一篇 6 万多字的论文《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章编入彭雨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一书出版，全面论述了明清时期全国东南西北商品的流通进程、商品种类、商品价格和市场网络等。同时撰写和发表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人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往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等论文发表，并出版了《广东商帮》（香港中华书局 1995 年）和《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年）专著，最后得出结论，乾隆十五年（1750），全中国国内商品贸易总额值达到 4 亿银两，而且在某些商人经营的商业贸易过程中出现了“包买商”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

在研究商品流通过程中，我发现自嘉靖元年（1522）至道光二十年（1840）期间，明清政府并非是实行完全的海禁政策，而是实行开放广东（广州）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允许中外商人在广东（广州）进行贸易来往，所以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也是发展的。于是，我撰写和发表了《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明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

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明中叶至清初的中日私商贸易》（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04年第37期）等论文，和编著出版了《广州外贸史》（上、中、下）一书（广州出版社1995年）以及主编出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副主编出版《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等书，论证了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国的商人络绎不绝前来广州同中国商人做生意，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res Lj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情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的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5]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 - 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商船有312艘；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 - 1838）增至5107艘，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省和广东省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和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6]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省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委托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商直接贸易。于是我又研究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撰著和出版了《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和《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并发表论文《广州十三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21 世纪经济导报》2005 年 12 月 26 日）等，阐述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和不十分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就成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好更活。正如英国下议院于 1830 年（道光十年）对来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的报告说：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 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7]

而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入和租居的澳门则成为当时中外贸易往来的中转港。于是我撰写和发表了《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和出版了《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 1995 年）一书以及与别人合作编辑发表《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资料汇编》（澳门《华侨报》1995 - 1998 年连载）等，阐述明清时期中外商人通过广州 - 澳门 - 长崎；广州 - 澳门 - 果阿 - 里斯本 - 欧洲；广州 - 澳门 - 望加锡 - 帝汶；广州 - 澳门 - 马尼拉 - 墨西哥 - 巴西；广州 - 澳门 - 温哥华岛；广州 - 澳门 - 纽约 - 波士顿 - 费城；广州 - 澳门 - 澳大利亚；广州 - 澳门 - 俄罗斯等 8 条航线来往贸易，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如生丝等运往世界各国销售。而 18 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不久；美国仍是农业国，1830 年的 1500 万人口中，多数劳动人口从事农

牧业，直至1929年仍有45%从事农牧业^[8]。所以，当时世界各国根本没有多少民生商品可以打入中国市场，只好携带大量白银货币来广州购买中国的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于是我在论著中得出结论：

“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了1489.9万两。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的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0]

这么一来，使广州呈现一派对外贸易繁荣和富甲一方的景象，正如时人诗云：

“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11]

三、研究明清与海外贸易相连的中西文化交流

在研究上述贸易全球化的中外商品流通过程中，我同时看到大量伴随海外贸易而出现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文资料，于是不揣鄙陋撰写和发表了《15—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社会科学阵线》1991年第1期）、《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国家的传播和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